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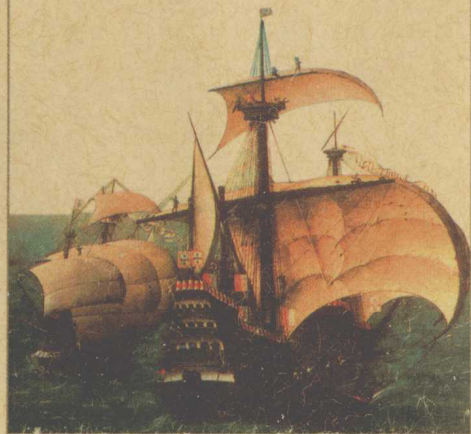
CHRONICLE OF MACAU

澳门 编年史

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 主编

第一卷 明中后期

(1494-1644)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CHRONICLE OF MACAU

澳门 编年史

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 主编

第一卷 明中后期

(1494—1644)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澳门编年史/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218-06327-0

I. 澳… II. ①吴…②汤…③金… III. 澳门—地方史—
编年体 IV. K296.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9186 号

澳门编年史 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赵殿红 钟永宁

装帧设计: 林小玲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经 销: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6327-0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12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20.00 元 (共 6 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序一

澳门有两座山，一座称东望洋，一座称西望洋，两山之间就是古代的澳门。从地域来看，澳门确实很小。然而，就在这样一片弹丸之地上，却衍生了令世人震惊且改变16—18世纪世界进程的大历史。确如清末商衍鎏之诗：“两洋咫尺判西东，放眼环球九万通。”以咫尺之地通“九万环球”，这就是历史展现的澳门之真谛。

正因如是，对澳门这样一部大历史该如何书写？中外前贤已呈多种澳门史著，精彩纷呈。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澳门大学兼职教授吴志良、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汤开建及葡萄牙中国学院澳门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国平三位先生，在前人基础上又编纂完成一部六卷本的《澳门编年史》巨著，皇皇三百余万言，耗时长达五年。三位学者均是海内外著名澳门史专家，他们以极其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及科学客观的学术精神修史，“无征不信”，“无据不言”，力图给后人留下一部可征可引的信史。我是老澳门人，虽熟识澳城的山水、街衢、民屋，然450余年的复杂历史总是给人以时隐时现、时清时浊之感，令人难以把握。故此，澳门迫切需要一部科学客观的信史，三位教授的努力即在于斯。

澳门大学是澳门的最高学府，亦是澳门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更是聚集最多科学研究人才的澳门研究基地，故加强与发展对澳门历史及“澳门学”的研究亦是我校义

不容辞的责任。《澳门编年史》的完成与出版即是我校推进澳门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且，我们仍将继续。最后，我衷心祝愿，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最重要的遗产——澳门历史研究能够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让“澳门学”同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样走出澳门，进入世界学术之行列。

谢志伟

2009年7月30日于澳门大学

（谢志伟，澳门大学董事会主席）

「序二

中国有悠久的修史传统，撰史则有诸种形式，如纪事体、编年体、纪传体等，内容涵括制度变迁、城乡发展、军事沿革、商业沉浮、文化兴衰等。有些历史记载简短明晰，就事论事；另一些则兼容并包，集为大成。这套《澳门编年史》当属后者。受邀作序，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是一部编年体巨著，由细小的历史片断甚或每日的历史事件，连缀而成宏观的历史叙事。此类手法虽然并非首创，但以其独特和广泛，必将成为研究澳门史和中葡关系史的权威之作。简言之，本书对于相关广泛领域的深入研究，包括广东史、香港史、传教史及欧亚交通史等，均有无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同类作品中，较早者为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的《澳门编年史》（*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原为葡文，后被译为中文。但其远不及本书之丰满，且多依据西文史料，尤其是葡语文献。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所编本书与施白蒂书形成鲜明对比，兼顾中外文献档案，收纳了各语种的原始或二手材料，包括未刊文件、学术著作、专题论文、翻译材料、报刊内容以及各种报告、信件等等。加之施白蒂书已出版有年，许多新材料和新作品不断涌现，本书编者有鉴于此，将其尽收新作之中。

但这本全新的《澳门编年史》并非只是“修订”而已，它同样采撷某些特定时间段中的每月、每周甚至每日纪事

[例如费茂实 (Moises Silva Fernandes) 的作品]。在此意义上说, 本书更像一本现代版的《澳门实录》, 讲述重要史实, 有时只是简单总结, 有时却插入大量注释, 包括原始文献及早期的二手资料, 并对所用史料时有评述。

对于大量史事, 必须先做基础研究, 而后方能提纲挈领, 清晰而简练地表达出来。这种“背景”研究自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需要充分而细致的学术钻研。吴、汤、金三位先生是澳门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他们熟知不同语种之史料, 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葡早期接触的文章。因此, 在汉语世界的学者中间, 恐怕没有另外一个团队, 能够完成这样一部令人钦佩的里程碑式的巨作。

下文就全书内容略谈几点观感。

首先, 如前所述, 本书注释繁多, 令人不由倍加关注其所用材料。许多编年体史书根本不加注释, 本书并没有机械照搬史料, 而是另辟蹊径, 选择了一条创新之路。多数情况下, 尤其是在存疑之处, 或是观点有争论之处, 作者总是将材料或观点一一罗列, 以求备考。关于妈阁庙和妈祖的说法即为显例, 学界对澳门妈祖信仰的某些早期事实存有不同看法。也许辩论仍将继续, 但本书铺陈众家之言, 乃为读者所幸。

其次, 多数情况下, 对于某个专题或特定时期, 作者力图展现所有的 (或大部分的) 权威专著和主要论文。例如, 对于 18 世纪下半期, 再三参考和引用了瓦莱 (António Martins do Vale) 的《澳门的葡萄牙人 (1750—1800)》(*Os Portugueses em Macau...*, 澳门, 1997 年出版) 及索萨 (George B. Souza) 的《帝国的幸存》(*The Survival of Empire...*, 剑桥, 1986 年出版)。我这样说, 是因为早期甚至最近研究澳门的一些作品, 并不总是令人信服, 中文论著常常曲解某些欧洲作品, 而欧洲和美国学者们又总是忽略重要的中文专著及论文。本书则以一种高度调和的姿态, 为这种隔阂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说, 三位主编的贡献确实不同寻常, 他们提供了如何使用、选取和过滤中欧史料的新的标准。

再次, 本编年史的内部编排十分清晰, 并且厘清了许多问题。这引出一个重要的话题: 如何将澳门的漫长历史分离出一个个别有意味的周期? 没有人质疑这样一个事实: 结束于 1640 年之前的澳 (门) 日 (本) 贸易, 是澳门遥远历史上的大事件, 与荷兰侵占马六甲 (满刺加)、葡萄牙脱离西班牙的统治、明清鼎革易代相呼应, 但其后的历史却难以描画出清晰的脉络,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对时间如

何分期 (segment time) 有一样的看法。本书所暗含的时间断面, 或许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种新鲜的“模型”, 甚至可以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接受。

最后, 同期发生的历史事件, 可以在本书中很容易地循着时间的踪迹发现其始末。编年史如同日记, 以时间顺序严格排列, 但必须使读者能够确定叙事线索的开头和结尾, 找到一连串“松散组合”潜在的内部结构。换言之, 读者自己一定能够不太费力地发现特定的历史 (或主要事件) 何以展开, 何时开始, 何以结束, 何时结束。这听起来很简单, 但历史学家面对的是多维空间的历史舞台和千头万绪的历史情节, 必须谨慎小心地选择材料, 专注于主要事件而不失却章法。对于研究较为成熟的历史时期, 这或许并不复杂, 但对于存在丰富的文本证据、需要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加以选择和组织的历史时段来说, 事情就变得非常棘手了。对于中葡关系史和澳门史, 可以说早期的历史比较易于把握, 但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历史则存在无休无止的问题。我认为本书编者相当得体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使不甚了解特定事件的读者, 也能轻易理解这本巨著所提供的“影像”, 抓住不同事件及行为发展的线索。

换一种说法, 本书的“叙事”一直是清晰的, 这对一本历史著作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而这种清晰的叙事在此又是可资参考的真正史料。同时, 本书又发掘出新的研究范畴, 尤其是后期的几卷, 因为这些时期较少全面论述可资参照。颇负声望的东方基金会 (Fundação Oriente) 出版的马葵士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编撰的标志性作品, 虽然对这些历史片断颇有见解, 但因它不是编年史, 不可与吴、汤和金之大作比较, 而前者不包含如后者这么多的历史细节。

虽然如此, 澳门史专家们仔细浏览这本编年史, 会感觉某些至今仍被历史学家忽略或处理不当的问题, 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例如一个颇为复杂的话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香港被日本军队占领, 澳门官方虽守中立立场, 但面临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我们知道澳门的确幸免于难, 但它为什么能够成功避险? 它是怎样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 这些很值得我们认真讨论。

再次回到史料问题。英美国家关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澳门史料经常带有偏见, 并不十分可靠。事实上, 如果不是用英美国家的眼睛观察, 近代史上的澳门会更好些。从这个意义上说, 编年史“清后期”及“民国时期”卷的编撰令人振奋, 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

一种包罗万象的体系参考，从而激励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这正是权威可信的通论性作品应当具备的品质：略述我们已知的东西，同时提供一个可资深入探究的广阔平台。

我在此转换一下视角来总结上文：中国有悠久的修撰编年体史书的传统，这些史书有的反映个人见解，有的呈现传统立场或支持官方观点。二十四史的本纪卷、地方志及年鉴多是史事的列举，而本书既遵循了这些传统体例，又有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具有典型的“澳门特色”。主编们小心照顾各方需求，力图形成一个能反映“澳门独特性”（Macau identity）的综合体。简言之，他们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体例，为未来编年体史书的编撰提供了一个突出的范例。

必须承认，没有历史学家可以重现历史的真实图像，我们的意识受制于各式各样的外部影响。我们常受他人左右而不自知，受观念导引而不自明，受复杂理论的迷惑而不自觉，受某些“史料过滤器”的摆布而无可奈何。社会状态、政治力量、经济因素所组成的母体生发出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我们对过去的判断则依赖于对这些事件的综合分析，同时又加入了研究者的个人喜好。相应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文和葡文著作中所反映的澳门历史图像也是千变万化，常常是悄无声息，有时又喧闹异常。本书主编吴、汤、金三位先生常年发表讨论、演讲和论文，多数成果扎实而富于说服力，他们所做的历史修正工作意义非凡。他们深切明了撰写历史的困难所在，并努力寻找新方法，开拓新观点，以解决历史研究本身固有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正是不断提高和丰富我们的认知，探索潜在的历史结构，推开紧闭的历史门窗。本书是他们多年钻研的重要成果，当之无愧为近期史学研究的里程碑。探索历史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毫无疑问，本书是一份精工细琢的时代全景图。我们当为作者们的巨大功绩而庆贺。

普塔克 (Roderich Ptak)

2009年4月于慕尼黑

[罗德理希·普塔克 (Roderich Ptak)，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著名汉学家]

前言

如果从嘉靖八年（1529）中文文献出现“蚝镜”一词算作澳门历史开始的话，那么澳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走过了480多年；如果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门并开始建立澳城算起的话，则澳门城市的历史也已走过了450多年。不管是480年还是450年，对于澳门这座小城来说，其历史之悠久，足使其居民引以为荣。然而，迄至今日，这一悠久的历史并未产生一部“信史”。虽然中外先贤及当代历史学者在近一百余年间都曾努力地去重现与建构一部澳门“往昔”的历史，但是，这些重现与建构在主观和客观上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致使其著述不能成为澳门历史的“信史”。尽管如此，他们的努力与成就仍值得我们尊重和记忆，他们是：印光任、张汝霖、龙思泰（A. Ljungstedt）、庇礼喇（A. F. Marques Pereira）、菲尔南德斯（J. Gabriel B. Fernandes）、法兰萨（Bento da França）、波乃耶（J. Dyer Ball）、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博克塞（C. R. Boxer）、白乐嘉（Jack M. Braga）、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周景濂、张天泽、张维华、戴裔煊、黄文宽、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索萨（G. B. Souza）、瓦莱（A. M. Martins do Vale）、罗理路（R. M. Loureiro）、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马奎斯（A. H de Oliveira Marques）、梅

斯基塔（Gonçalo de Mesquita）、霍启昌、黄启臣、邓开颂、黄鸿钊、费成康、万明、谭志强等。如果我们不要求对澳门以往历史的正本清源、追根到底、明了真相的话，如果我们允许澳门的历史可以存在大面积的空白和长时间段的“无历史”的话，那么，上述的研究成果和著述就足以令人炫目，满足一般的知识需求了。然而，历史是科学，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澳门需要一部“信史”。何谓“信史”？即以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使用第一手资料或第二手资料进行研究和考证而完成的客观、准确、全面、系统的历史。我们编纂《澳门编年史》的目的即在于此。当然我们知道，完成这部“信史”绝非易事，但会竭尽全力朝着“信史”的方向努力，希望能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一步一步走近“信史”。

在我们之前，施白蒂女士出版过与本书同名的《澳门编年史》。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人家出过，为何你们还要出？这就有必要对施白蒂的《澳门编年史》进行评说。葡萄牙人很喜欢以编年史的形式来编纂历史。早在16世纪，即有著名的巴罗斯（João de Barros）与库托（Diogo do Couto）的两部《亚洲旬年史》；从19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就已经开始编纂澳门编年体史书。苏一扬（Ivo Carneiro de Sousa）教授称：“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从欧洲中心观或葡萄牙中心观来选择地撰写澳门历史，并对此进行教育和推广的倾向已经出现。在此时期，出现了那些起始于16世纪初，按照年月来‘公正地’叙述澳门编年史的大部头著作。”^① 1868年由庇礼喇编写的《澳门历史及中国与基督教人民关系大事记》开创了这种编年史的先河；1883年菲尔南德斯因袭庇礼喇的著作，完成了《澳门历史札记》一书；1888年法兰萨完成《澳门历史补遗》；1905年波乃耶完成《澳门：圣域，东方宝石》；1954年高美士完成《澳门历史大事记》；1981—1984年间文德泉神父又先后完成《16世纪的澳门》、《17世纪的澳门》和《18世纪的澳门》^②。施白蒂的五卷本《澳门编年史》就是在上述编年史的基础上完成的，尤其是文德泉的16—18世纪的澳

①苏一扬：《前工业化澳门的居民及人口体系（16—19世纪）》，载《澳门史新编》第3册，第1022页。

②文德泉神父尚有《19世纪的澳门》手稿一部，在里斯本，施白蒂女士曾参考。

门编年史，几乎是施白蒂书前两卷的大部分来源。从19世纪到20世纪前50年的两卷，施白蒂则利用其担任澳门历史档案馆馆长的便利，开始较大规模地使用馆藏的《澳门政府宪报》及政府和民间收藏的葡文档案，为19—20世纪的澳门历史公布了大量的新资料，展示了许多前人未知的史实，这是施白蒂著作的核心价值所在。澳门基金会后来组织人员将施白蒂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所以其《澳门编年史》在中国学者的澳门史及中西关系史研究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也被中国学者广泛接受与使用。但是，限于当时档案史料披露程度、史学研究推进的深度，时代背景以及作者不懂中文等因素，施白蒂的《澳门编年史》是一部存在着严重缺失的澳门史著作，其中文译本存在问题更多。经过粗略梳理，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该书完全是从“欧洲中心观”或“葡萄牙中心观”来选择性地撰写澳门历史。全书的主体除了来远东开拓的葡萄牙人及澳门土生人外，其余就是经澳门入华的欧洲传教士；在施白蒂的史笔下，欧洲人是澳门的绝对主体，澳门史就是一部葡萄牙人的“殖民史”。甚至称，莱奥内尔·索萨（Leonel de Sousa）、狄奥戈和吉略麦兄弟（Diogo e Guilherme）、佩德罗·巴莱托（Pedro Barret Rolim）及贾梅士等人“创建”了澳门。而她完全无视明清时期长期对澳门拥有领土主权的中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在澳门制定的法令、规章和中国官员对澳门具体管治的事实。对于一直是澳门社会人口主体的华人、华绅与华商，施白蒂在书中基本不提，或是轻描淡写。一部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而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中国政府，忽略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这是完全不尊重澳门客观实际且极为偏颇和错误的史观。

第二，由于施白蒂不懂中文，又没有借助对中文资料的翻译，故在洋洋五大卷的通史中竟没有使用一条中文古籍文献、中国政府档案、中文报刊及中文金石碑刻方面的资料，更不要说使用中文资料来核对与考证葡文资料的正误。极为重要和珍贵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收藏的中文澳门档案及天主教档案，在书中未有表现和利用，虽然在参考文献中提到了《明史》、《澳门记略》及《香山县志》等书，但并未见其在正文中采用上述中文古籍史料来进行编年史的编纂。不使用中文档案文献而完成的澳门史，不使用中葡文献档案互证的澳门史，其所载史实

的可信度是根本无法保证的。这就是施白蒂著作存在的最大缺陷。

第三，施白蒂书 16—18 世纪部分虽然没有注释，但经过核对，其文字主要来源于文德泉、潘日明、龙思泰、徐萨斯、博克塞及热苏斯·玛丽亚（José Jesus Maria）等人的著作，而以文德泉的著作为主。这一时期最原始的文献，如巴罗斯的《亚洲旬年史》，库托的《亚洲旬年史》，《广州葡囚信》，《葡萄牙人发现征服印度史》，《印度传奇》，《方济各沙勿略通讯簿》，《季风书》，《平托信札及其他文献》，《耶稣会会士在亚洲》，《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志》，《多明我会中国传教志》，《中国风物志——16 世纪文献集》及葡萄牙、西班牙档案馆与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澳门的 16—18 世纪的档案多未采用。^①正是由于在史料搜集上的贫乏——这种贫乏，不单是指中文史料的缺失，即使是西文资料的认真开掘与利用，施书也是做得极为不够——以致对这一部分历史叙述得极为简略，16—18 世纪 300 年的历史，仅占 16 万字的篇幅，有很多年份根本没有历史记录，有些年份则仅有一行字。其中澳门重要史实缺漏之多，当以千百计。

第四，施白蒂书关于 19 世纪及 20 世纪前 50 年的编年史虽然大量地引用了澳门政府各机构的档案和《澳门政府宪报》及其他葡文报刊，提供了许多澳门历史事实的重要信息，但书中公布的档案十分简略，有的仅提供一个目录，如“1876 年 1 月 21 日，关于一种中国幸运博彩白鸽票的规定”；“1876 年 6 月 3 日，成立一个委员会，审议关于颁布什一税和其他税项的法令”；“1880 年 6 月，澳门华商向总督说明修改葡国商法的理由”；“1914 年，关于混合教育的第 300 号省训令”；“1912 年 8 月 14 日，海镜酒店租约续期”；“1919 年 4 月 15 日，《澳门助学会章程》”等等。这种一句话的历史在施白蒂著作中比比皆是。既不对这些澳门法令、制度、章程、税制内容详细介绍，更无它们的起始缘由、实施过程及作用意义。很多仅是有此制度的意图或计划，而在澳门根本没有施行。因此，我们怀疑，这些让所有的读者均无法明白的“一句话的历史”究竟有无存在的必要。

第五，施白蒂书还记录了许多澳门编年史中的背景历史，但交代这些背景历史时，大都不着要领，且存较多讹误。如施书开卷第

^①尽管在施白蒂著作附录的《参考书目》中，上述文献有一部分曾为其参考，但从上述文献中所保存的大量澳门历史事件与人物活动的资料来看，施书中并没有采用这些文献、档案的痕迹。

一条：“公元前479年4月3日，孔子去世，享年72岁。这位出生于山东的哲学家第一次指出西地之民有智者。”这一段话同澳门编年史有什么关系？孔子何时说过此语？又如“1901—1905年，满清改良运动”，“1905—1910，爱因斯坦理论”，“1905年，孙中山宣布三民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类似这种大而无当的历史背景记录，既不准确，且有讹误，在澳门编年史著作中实在没有出现的必要。

第六，施白蒂著作中存在的基本史实错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硬伤”）极多，每卷都有相当的数量。如第一卷“1522年，根据平托之记载，宁波陷落”。宁波何时被陷落，又陷落于何人？完全是无中生有；又第一卷“1568年，维依伽（Tristão Vaz da Veiga）舰队司令下令在氹仔建起第一道城墙”，葡萄牙人开发氹仔的历史早至16世纪？令人莫名其妙；再如若奥五世于1750年去世，而施白蒂书在1750年后，仍多次记录若奥五世继续给果阿和澳门下达谕旨与寄发信函；又如“1888年5月5日，广东总督李鸿章向本澳政府提出在澳门与广州之间设一条电报线路的建议”，而当时之两广总督实为张之洞；又如卢九与卢廉若为父子二人，但施书中多次视为一人。至于书中中外人物逝世的时间，施书更是误载不少，如瞿西满（Simão da Cunha）、马葵士（Pedro Germano Marques）、梅洛（Alexandrino António de Mello）、席尔瓦（Manuel José Maria Gonçalves da Silva）、卢九等等。该编年史中文译本的翻译错误则更多，在此就不一一举例。

有鉴于此，重新编纂一部客观、准确、全面、系统且经过严谨研究和考证的《澳门编年史》，就成为中国澳门历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当然，我们编纂《澳门编年史》绝不是针对施白蒂女士的著作纠错、订误和补缺，我们希望按照中国的史学传统，结合葡萄牙编年史的史学方法，重新编出一部中西方法结合的《澳门编年史》来。中国的编年史传统源远流长，有左丘明《左传》式的编年史，有司马光《资治通鉴》式的编年史，有商辂《资治通鉴纲目》式的编年史，还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式的编年史。在上述几种编年史体例中，李焘的编年史涵盖的信息量最大，形式最为自由，不仅有历年大事之详载，亦有一般事情的简略记录。大事则录其起始、本末、缘由，乃至给予评议，甚至涉及事件的重要奏议、信函均予以全文公布；逢重要人物，不仅录其生平主要事迹，而且追述其先世，涉其后人。遇史文歧异者，则附以考异，能断则断，不能

断则诸异并存。我们采用的大致就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形式，所不同的是，我们的编年史采用中西历并行纪年，而月日则全部换算成西历，而且史文均注明资料来源，以增加述史的科学性。

二

中外学者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不仅对有关澳门历史的中西文献档案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发掘、整理与翻译，而且针对澳门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理论和专题研究，特别是一大批博、硕士论文的完成，将澳门历史的专题研究推至一个更为深入的境界，重新编纂一部《澳门编年史》的时机已大体成熟。经过整整五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完成了六卷本的《澳门编年史》，总字数逾300万字。我们相信，这部书的出版，为澳门历史研究走近“信史”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之所以如此说，有以下几点理由：

一、本书是近二十年来有关澳门历史的中文文献档案整理研究的集大成。本书采用的中文文献档案，不仅有澳门回归前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广东省档案馆、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暨南大学古籍所等单位公布和出版的档案文献书籍，如《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澳门专档》、《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及《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等，最近几年新出版的中文档案、文献亦纳入编年史中，如《清中前期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汇编》、《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葡萄牙图书馆档案馆藏中文文献》、《香山明清档案辑录》、《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葡关系卷）》、《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等。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了一批过去辑录澳门中文档案文献时未曾发现的同澳门关系密切的中文文献刊本、抄本和稿本，如张本的《五湖漫录》、刘尧海的《督抚奏议》、韩霖的《守圉全书》、邓士亮的《心月轩稿》、郑芝龙《（崇祯）郑氏家谱》、张镜心的《云隐堂文录》、姚启圣的《忧畏轩遗稿》、彭昭麟的《从征诗草》、《革命史系：卢怡若传》及《高可宁先生言行录》等等；更为令人兴奋的是本书全面征引了新发现的第一部香山地方的采访册——《道光七年香山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上述文献的发现和利用，为澳门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与新认识。可以说，本书在

中文文献的开掘上，较十年前又有很大的进步。

二、本书是近几十年来有关澳门历史研究各语种翻译著作和译文的集大成。初步统计，本书征引的已出版、发表的译著、译文超过200种，涉及语言主要有葡、西、荷、法、英、日六种文字。其中有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陈用仪译《澳门寻根》，范维信等译《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何吉贤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姚楠、钱江译《中葡早期通商史》，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黄鸿钊译《历史上的澳门》，程绍刚译《荷兰人在福尔摩沙：1642—1662》，江树生译《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张振辉译《中国使臣卜弥格》，萧濬华译《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刘浚余等译《利玛窦全集》，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19世纪》，金国平译《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崔维孝等译《澳门与共和国体制在中国的建立》，秦传安译《澳门史》，何高济译《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刘平译《华南海盗：1770—1810》，金国平译《澳门编年史：20世纪》，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等。上述译著构成了本书外文资料的一部分来源。另外我们又从金国平、吴志良、李向玉、崔维孝、耿昇、李长森、普塔克（Roderich Ptak）、罗理路、萨安东、罗里多（Rui D'Ávila Lourido）、阿马罗（Ana Maria Amaro）、苏一扬、索萨、戚印平、孟安娜（Anabela Monteiro）、施利萝（Leonor de Seabra）、慕容（Isabel Augusta Tavares Mourão）、董少新、张先清等人的论著中转引了不少译文，这些译文有些是一份年报，有些是一份信函，有些是一段游记。这些珍贵的片段译文，为编年史增加西、葡、荷、法、英、日等语种历史资料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由我们自己组织翻译的主要有博克塞《来自阿妈港的大帆船》，索萨《帝国的幸存》，卫思韩（J. E. Wills）《使团与幻想：康熙朝的荷兰与葡萄牙使节（1666—1687）》，潘日明《16—19世纪澳门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18世纪澳门的海上生活》，瓦莱（A. M. Martins do Vale）《葡萄牙人在澳门（1750—1800）》，福尔加斯（Jorge Forjaz）《澳门土生人家谱》，萨安东编《葡萄牙及耶稣会参与中国礼仪之争及康熙皇帝与教廷关系研究文集》、《葡中关系史料集》，陆南（Adrien Launay）《四川传教史》，文德泉《16世纪澳门》、《17世纪澳门》、《18世纪澳门》、《澳门及其教区》、《葡萄牙

远东期刊录》、《澳门地名》、《澳门的教育》，苏亚雷斯 (José Caetano Soares) 《澳门的医疗》，马奎斯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主编的《葡萄牙人远东扩张史》第3—4卷等等。为了加强清中期澳门历史的细节，我们还组织力量对《中国丛报》、《广州纪录报》、《华友西报》等几份英文报纸有关澳门资料进行翻译。经验表明，西文原始资料或翻译资料占有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学者的澳门史研究质量的高低。来自上述四个方面的翻译，使我们在使用西文资料的比例及占有量上，不仅超过了西方学者，而且还发现了很多葡萄牙学者未能发现的西葡语文尘封档案。^① 这一点是经过20余年的积累而完成的。

三、本书是百余年来澳门历史研究优秀成果的集大成。该书基本上将百余年来澳门历史研究优秀成果 (包括专著、论文) 蒐罗齐备，我们征引的以往研究著作及论文 (含博、硕士论文) 计有650种以上，早至龙思泰、徐萨斯的作品，晚至2008年出版的《澳门史新编》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和200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我们采摘上述研究的精华，将其准确的史实表述、精当的历史考证、真实的原档翻译纳入编年史中，成为编年史中基本史实的来源之一。但对以往存在问题较多，以相互抄录为主而又不注明出处的史著一概不予引用。本书尤其注意采用近10余年来国内外完成或出版的博、硕士论文，这些澳门历史研究最前沿的成果，均表现在本书的编年纲目中。

四、澳门现代史的研究过去是一片空白，施白蒂的《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和马奎斯《葡萄牙人远东扩张史》第4卷应是全面描绘这一时期历史的学术专著，但均嫌简略。他们征引的葡文档案文献不算少，但很多仅是一份档案目录，基本无实际内容。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以后的澳门完全是一个华人社会，华人活动是澳门社会活动的表现主体，但在葡萄牙人所著的20世纪澳门历史中仍然很少对华人活动的记录。震惊全国的“五二九”事件及省港大罢工，在葡萄牙史学家的笔下均一笔带过。对澳门华人社团及国民党领导和组织的社团在澳门的活动根本不提。本编年史在资料的开掘上，从四个方面强化了澳门现代史研究：一是全面系统地利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辑录的有关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在澳门活动的档案；二是全面使用了《民国日报》、《申报》、《华字日报》、《工

①参阅金国平编译的《西方澳门史料选萃 (15—16世纪)》之《序言》(吴志良)。